

运城是孕育最早中国的地方

■王巍



王巍

山西是文物大省，运城又是在全国的地级市当中，国保单位居首位。

西侯度遗址是实证中华大地早期人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遗址，她的年代距今200多万年。西阴遗址在中国百年考古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是第一次中原地区的文化向周围强烈的辐射。从夏代开始进入到青铜时代，但是它的原料来源一直是一个谜，中条山一带的铜矿应该说距离更近，更有可能。最近这些年发现的几个遗址，让我们意识到，也确实证明了我们的这种判断。

夏商时期的铜矿的来源，运城这一带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而正是有了铜矿，才有了我们发达的青铜文明。进入新世纪以来，几个重要的诸侯国的(考古)发掘，多数都是在运城地区，极大地丰富了对西周王朝时期历史文化的认识。

最近这些年，引起大家关注的垣曲北白鹤

墓地，是召公跟随周平王东迁这个阶段的，这也说明运城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区域。还有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最近几年夏县师村的(考古)发掘，应该让我们又一次认识仰韶时代的社会和文化。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师村遗址出土了六件石、陶雕刻的蚕蛹，这是在全国范围内最早的跟丝绸、养蚕缫丝有关的发现。绛县周家庄遗址可以说是同时期在黄河中游地区面积最大的遗址。无论是从旧石器时代到春秋时代，一直到后来，运城始终是中华文化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我用一句话来概括，运城是孕育最早中国的地方。我也希望运城的历史文化的研究和成果的转化传播，包括文旅结合，走出新路子，取得新成果。

(作者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本文是其在全省第八次旅发大会暨第33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开幕式视频致辞记录)



「我田野考古的足迹，从未离开过运城」

专访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院院长戴向明

本报记者 李丹凤

“30年来我从事田野考古的足迹，从未离开过运城。从考古上看，运城是块宝地，表里山河、物华天宝，中华文明在此多次浓墨重彩地留下过印记……”戴向明多年来扎根运城开展考古工作，今年他应邀参加了本次旅发大会。

戴向明，现任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院院长，曾参与山西垣曲商城遗址的发掘和垣曲盆地聚落考古调查，主持了山西运城盆地东部新石器至早期青铜时代聚落考古调查与研究项目，此后又主持了山西绛县周家庄史前遗址和绛县西吴壁遗址的发掘工作。运城是他的考古作业之地，更是他眼中的考古宝地。

9月21日，2022年山西省第八次旅游发展大会暨第33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开幕之际，记者采访了戴向明。

从仰韶文化中期，包括运城在内的陕晋豫交界地区庙底沟文化中心的文明曙光，到龙山时代前半阶段庙底沟二期文化辉煌的高光时刻，从龙山后期更为精美的玉器、彩绘陶器等贵族墓葬陪葬品及有大型壕沟环绕的聚落遗址，到青铜时代精美绝伦、独步世界的青铜礼器……戴向明向记者梳理了河东文明的前世今生。

文明曙光：商城密码

“一开始做考古，我就到运城参加垣曲商城遗址的发掘。这个遗址在一个高台地上，它的山脚下就是黄河，黄河对岸是河南的狮子山，晋南表里山河的气势扑面而来，带给我非常新奇和震撼的感觉。”谈起首次到运城田野考古时，戴向明印象美好而深刻，“那时候条件比较艰苦，每天都坐着三轮车一路颠簸到工地。工作之余，我喜欢拿着相机到处转转，见识当地的风土民情，看看古城晋南古老民居门头上的砖雕……当地民风非常纯朴，我跟村民们相处得很好。”

关于垣曲商城遗址的意义，戴向明表示，它作为早期时期少有的城址之一，是中国早期的城市雏形。虽没有都城的规模那么大，但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是中原王朝的核心区域之一。因为它的脚下就是黄河渡口，过了黄河到河南，就到了当时的王朝腹地。周王朝为了占领晋南的土地和获取这片土地上的铜、盐等重要资源，就在这个关键的交通要道上设置了这样一种所谓城堍型的城址。

在戴向明看来，垣曲商城遗址的重要性还在于它建立了考古学文化的序列。他说：“在这之前，我们一代考古人曾主持发掘了垣曲古城东关遗址，这是一个新石器时代遗址，年代更早，包括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时代的遗存。垣曲古城东关遗址和垣曲商城遗址都非常重要，而且这两个遗址正好前后衔接，就把晋南或者靠近黄河一带的晋南地区的整个考古学文化的序列完全建立起来了，这个非常重要，就像我们建立家谱一样，了解一个家族，要有一个谱系，这两个遗址就是把家谱谱系给建立起来了，其重要性正在于此。”

穿越盆地：丈量文脉

2003年，戴向明的考古工作重心从垣曲转移到了运城盆地这样一个更广大的天地。

2003年到2006年，他先是带领团队作了区域性网状考古调查，几年时间，他们过村走街，用脚步丈量整个运城盆地东部广阔的大地。

“整个田野都被我们‘扫荡’了一遍。我们对从新石器时代到早商时期的遗址有了非常全面的把握，包括遗址的大小、规模、古代文化遗存，因此，这个阶段的遗址很少有遗漏。”

在前期调查与试掘的基础上，2007年，戴向明带领的国家博物馆考古院考古团队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以及运城相关文物保护单位合作，正式开始在周家庄遗址开展发掘工作，此项工作持续了十年。

问及这十年发掘工作的收获，戴向明表示，之所以要发掘周家庄遗址，是因为它的规模很大、规格很高，是当时我国最大的遗址之一。而且遗址上有十二三米宽、七八米深的大型壕沟环绕。这么大的一个工程，需要大量的人力来挖掘做防护的壕沟，其中必定有一个强有力的社会组织。这就与早期国家文明的起源相关联，因为所谓的文明起源、国家起源，它首先是要有一个非常庞大的社会组织。“所以周家庄遗址的发掘工作，我们做了十年，其终极的学术目的是研究晋南早期国家文明起源。”

夏商炉火：烛照中条

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入选“2019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一遗址由戴向明负责，中国国家博物馆、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及运城城市文物研究所合作发掘。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青铜时代，铜礼器与武器，皆为国之重器，而铜就属重要的国家战略资源，青铜冶炼技术就是当时先进生产力的体现。因此，西吴壁等冶铜遗存的发现，不但填补了中原地区早期青铜产业链的空白，而且为探讨夏商王朝崛起与获取、控制和利用铜这种重要战略资源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新资料，对于研究夏商代表的早期中原王朝文明体系和内涵也极具价值。

从2018年开始，戴向明在绛县西吴壁遗址带队工作。说起西吴壁遗址的发现过程，戴向明觉得十分“幸运”：“这个遗址很出彩，为什么要做一个遗址？是因为我们之前在这里发现时，发现它是一个面积达到七十来万平方米的夏商时期的大遗址。”

夏商周是中国青铜时代，以发达的青铜文明著称于世。青铜礼器作为国之重器，是中原王朝的贵族用品，是一个人等级身份的象征，它精美的程度、复杂的工艺独步天下。然而制作它的铜料从哪里来？这在过去是一个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

西吴壁的考古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大量的冶铜遗址重见天日，一个前所未有的遗址展现在世人面前。尤其是在这里发现了夏商时期冶铜炉残迹、木炭窑等遗迹，出土了大量矿石、铜炼渣、残炉壁，还有炼铜时的鼓风设备鼓风嘴儿……丰富了冶铜生产链的各个环节。

西吴壁遗址的新发现，解决了夏和早商时期中原王朝铸造青铜礼器的铜料来源问题，发掘了非常丰富的冶铜遗存，证实了这个地方是支撑早商中原夏商周王朝兴起的重要的战略资源的产地。

文物无言，却是历史最深情的讲述者。

在戴向明看来，“在不同历史时期，从史前时代一直到后来的漫长的历史时期，在河东大地这片沃土上，运城的先民有一种杰出的能力，他们凭借自身的资源优势，以及勤劳和智慧，不断地把这种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文化优势，从而达到一种文明的高度，甚至能代表中华文明的辉煌时刻。可以说，运城跟我们国家早期文明的形成发展、早期王朝的兴起密切相关，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地方。所以我说运城是个考古宝地。”

仰观天宇，时间更加深邃；俯身耕耘，未来无限可能。“相信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我们河东大地这片沃土上的运城人民，甚至山西人民，以他们的智慧和勤劳，必能创造更为辉煌的文明成果。”戴向明如是说。

晋商是关公文化最重要的传播者

——访著名学者、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

本报记者 王捷 薛丽娟



本报记者 陈方斌 摄

提起著名学者、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先生，很多人应该都不陌生。他曾在央视《百家讲坛》栏目中主讲《三字经》《弟子规》等传统文化，引起了强烈反响。他亲切儒雅的气质、机智幽默的语言和对传统文化精辟的解读，更是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9月21日—23日，2022年山西省第八次旅游发展大会暨第33届关公文化旅游节在运城举办，钱文忠先生作为嘉宾应邀出席活动，并在海峡两岸“关公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讨会上，表达了自己对关公文化的独到见解。活动期间，钱文忠先生接受了记者专访。

一座城市应找到自己的精神之根和文化之根

早在2002年，钱文忠就曾来过运城，这也是他与运城的缘分。

在他小时候，国家曾发行了一套连环画《三国演义》。其中的关云长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时还是孩子的他非常崇敬关公。后来，他到国外留学，还到海外工作了一段时间，真切感受到了关公文化的力量。他发现，关公文化在海外华人中极其兴盛，他们对关公充满崇拜之情，且保持着非常鲜活的祭拜仪式。这让他感到震撼。

“所以那时我就想，我回到关公老家解州，一定要看看解州关帝庙。”2002年，钱文忠回国后就来到了关公故里，并专程前往解州关帝庙祭拜。

第一次踏上运城这片土地，他印象十分深刻。当时，他在这儿走了一路，还曾去了夏县、芮城等地。在他的印象里，这里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是一个遍地是宝的地方。时隔20年，再次来到运城，他感触更深，“运城的发展速度很快，不像是过去了20年，而是又有了长足的发展。”

“当时的运城和今天的运城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他说，“无论是从城市的体量、现代化程度，还是从城市的整体精神面貌来看，已经完全不像是同一个城市了。”

这些年，钱文忠多次来到山西，前往很多村庄寻找历史遗迹。看到很多保存完好的宋、辽、金、元建筑，有的甚至还在使用，他很是欣慰。这些年他没来运城，但他对运

城并不陌生，会留意运城的消息。

这次到运城，他最深的感受不仅在于运城城市现代化水平，而是更深切地感受到，运城这片土地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精神之根和文化之根，找到了自己之所以成为这座城市生命理由，这个理由就是关公文化。钱文忠说，运城举办了33届关公文化旅游节，一定会有更好的未来。

“一座城市，赶上了物质发展和城市发展的历史进程，很幸运。但是如果一座城市能深切地感知、找到、认定自己的精神之根和信仰之根，那座城市就一定是一个福地，在未来会有更让人意想不到的发展。”他说。

将关公文化的忠义与晋商文化的忠信相结合

在钱文忠看来，关公不仅是一种文化、一种精神，更是一种信仰。在中国历史上，关公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共同创造出来的一个“神”。关公这一历史人物的很多优良品格，引发了中华儿女内心的共鸣。在后续历史发展中，我们全民投入了热情和真心，共同创造了我们民族的英雄。

历史上，关公是武圣，和文圣孔子齐名。钱文忠认为，“关公华容道义释曹操”，这种“义”是一种“博爱”，可以说在中国古代有着特殊的意义。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爱是分等级的，随着血缘关系远近而不同，血缘关系越近，爱得越深；血缘关系越远，爱得就淡一点，所以在中国的传统当中，爱你的敌人这种观念是没有的。“但是关公在华容道上，义释的不是朋友，而是一个敌人，而且这个敌人是当时关公所代表的政权最要紧的头号敌人，所以这是对中国过去所谓‘爱有等级’这种观念的重大突破。”他说，也正因此，关公才被认定为中国

关公文化，连接海内外华人的精神纽带

——访著名学者、中国摄影家朱正明

本报记者 游映霞



朱正明，湖北省委统战部原海外中心主任、中国摄影家、长江大学客座教授、西藏珠穆朗玛关帝庙文化顾问。

为寻访关公文化，39年来，朱正明远涉各大洲51个国家和地区，行程85万公里，拍摄数万幅珍贵图片，收集众多文物史料，出版了《寻访三国故地》《中国关帝文化寻踪》等专著；在海内外多次举办“世界关帝文化摄影展”，演讲中华关帝文化，在保护、弘扬关公文化上作出了巨大贡献。

第33届关公文化旅游节期间，他到运城，向关帝祖庙、市博物馆和关氏宗亲代表赠送了《五洲关帝图》。走到哪里，他都不忘传播中华关帝文化。近日，本报记者连线这位称自己为“关帝‘义工’”的旅行者，挖掘他与关公文化的故事。

记者：您不辞艰辛把关公文化送到地球“三板”，这源于什么样的信念和动力？

朱正明：2019年，注定是不寻常的年份。在世界各地，纪念关公的殿堂越来越辉煌，祭祀关公的场面越来越隆重，研究关公的论坛越来越高雅。绵延千年的关公文化热，显示出关公文化越来越旺盛的生命力。

那年元旦早晨，武汉漫天飞雪。我见到楼下竹林被瑞雪覆盖，越发挺拔。想到家乡当阳的麦城故地以及关公的凛然正气，提笔写下一首小诗：“一千八百多年前，也是一个冬天，您大义凛然退走麦城，一响呐喊，穿透千年：‘玉可碎而不改其白，竹可焚而不毁其节！您一言九鼎啊，九鼎一言……’”，这些年在寻找关公的旅途中，这位非凡人物对我产生了巨大影响。

仰望圣贤，我立下宏愿，要在地球“三板”——“南板”“北板”“世界屋脊”，不辜负祖国和人民的希望，把关帝圣像护送到地球三板，把中华关帝文化传播到地球三板，为世界人民祈福，为世界和平发展祈福。2019年，在中国北极黄河站15岁生日时，我将中华关帝像送到中国北极黄河站。极地中国文化中心主任李宝莲说：“北极是个顶天立地的地方，我们有责任在这里让中国故事、中华文化在这里留存，在这里扎根。”这也是我的信念。

记者：您什么时候决定将传播关公文化作为终身事业？

朱正明：我对关公的认识和感情是在不断发展和逐渐丰富的。20世纪50年代，在家乡湖北当阳，还是幼童的我随父亲前去关陵祭拜这位圣人。走进关陵，想到《三国演义》中的关公就在那里，对他的景仰在那瞬间达到了顶峰，自此我立志要做关帝这样义薄云天、浩然正气的人。参加工作后我曾任台湾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兼台办主任，一次接待台委台办中圣庙的关帝朝圣团，他们在关陵祭拜时，台湾朋友个个泪流

满面，那个场景让我十分震撼，这也进一步确信了关公文化为两岸关系的纽带，此后我对关帝爷的情感更深刻。20世纪80年代，当阳关陵修复后，我拍摄的一组关帝古陵修复的图片，被海内外多家大报争相登载。我真意识到，生长在黄河东岸的关公，是丝绸之路的形象大使，是中华民族道德偶像。这尊偶像，值得我们仰望，值得我们崇拜，值得我们坚守，值得我们传颂。自那之后，我立志要用毕生力量寻访传播中华关帝文化。

记者：国内外关公的影响力是怎样的，其发展内核是什么？

朱正明：这些年，泱泱中华，浩浩五洲，建立起千万座关公的宫阙，涌现了一个个关公文化团体。正是关公的“忠义仁勇信”文化道德精神，才有了传播于海内外的中华关帝文化，才有了遍布世界的金碧辉煌的关帝庙。

黄河东岸的山西运城，解州关帝庙一年一度的朝圣大典，海内外万余名关氏宗亲，聚集山西运城，万里寻根，祭拜先祖。喜马拉雅北麓的西藏定日，世界最高的珠穆朗玛关帝殿；珠穆朗玛南麓的尼泊尔，加德满都侨领已经申领土地，拟兴建关帝殿。在香港澳门，香港关帝庙，国际关公文化论坛已经成为品牌。在宝岛台湾，虔诚朝圣群众巡游，年复一年地传承着悠久热烈的中华传统文脉……大西洋畔的美国纽约，加勒比海岸的巴拿马中国街，印度洋西南的留尼旺岛，日本横滨中华街，韩国首尔东门，越南河内巴亭广场，马来西亚新山柔佛，新加坡城，印度孟买，澳大利亚……处处关帝殿堂为纽带，以华人华侨为核心，演绎着异国他乡的中华文化精彩。

记者：您认为，关帝庙遍布海外的原因是什么？

朱正明：在中国名目繁多的各种本土神祇中，唯有关公信仰融通了佛道儒三教，并覆盖了社会各个阶层，成为传统道德文化最大的公约数。澳大利亚有位侨领曾说，关帝文化体现了四种精神，这就是忠诚、信义、仁智、勇武。这四种精神蕴涵着中华民族文化的伦理、道德和理想。在百余年的经验总结里，海内外关公团体除了团结奉献，创新民主，更弘扬关公文化为核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倡导忠义仁勇的关帝精神，这是最重要的思想与文化保证。关帝庙有一重意义是，使海外华人皆

千古“义绝”，这一点也是关公特别珍贵的地方。

那么在新时代，如何更好地认识关公文化呢？钱文忠认为，必须意识到关公的祖籍山西运城这片热土，实际上是和晋商的发源密切相关的。

“关公文化不是高高在上的，而是与我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这也是关公文化延续至今的重要原因之一。”钱文忠说，“晋商之所以强大，是因为他们从关公身上学习到了义和信。他们非常讲究信义，讲究人际关系友爱、讲究同乡互助。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关公文化才会随着晋商得到传播。”关公文化的发展一直跟晋商的发展密切相关，晋商是关公文化最重要的传播者。

“这一点认识到，就非常有助于在新的历史时期，更好地弘扬关公文化。晋商所代表的企业精神、拼搏精神、突破精神，恰恰是新时代我们需要坚守的。而这种精神的支撑在于关公文化。”他说，“今天我们在弘扬晋商文化，所以新时代我们怎样更好地研究、弘扬关公和他所代表的文化价值，并将其和晋商、晋商文化结合显得尤为重要。把关公文化的‘忠义’和晋商文化的‘忠信’相结合，会让我们对关公文化在新时代的价值有新的理解。”

运城有向未来学习的决心和向过去学习的智慧

在钱文忠看来，“河东”两个字就是圣地，这片土地出现的名人太多了。“我们都知道司马光，他留下了《资治通鉴》这本非常重要的著作。衡水湖畔有太多司马光这样的圣人了。”他说。

不仅如此，钱文忠还发现运城建有很多河东书房，以及一些实体书店。“大家都知道要向前学习、向未来学习，学习是为了未来。要学习比自己先进的很容易，运城有大智慧，这个大智慧很难得。”他说，那就是在向未来学习的同时，更会向历史学习、向过去学习。“有计划和雄心，又有过去学习的智慧和感情，这种才是了不起的，既面向未来又不离自己的传统。学习过去，是为了更好面向未来，而认清未来趋势，是让自己明白在传统当中最应该学什么。”钱文忠表示，如果认清了我们未来的发展，那你就知道，实际上我们最应该学习的是关公的“讲信义、讲忠诚”，“运城有向未来学习的决心，又有向过去学习的智慧，非常了不起”。

采访最后，钱文忠以“晋是好运”四个字寄托对运城的祝福：“这四个字很精彩，既有运城的‘运’，也有三晋大地的‘晋’，又用了汉语的谐音，表达了吉祥和美好的祝愿。祝运城‘晋是好运’！”

有认识，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养华人新生代对祖国文化的认同。关帝庙，已经成为华人华侨思念故土、祭拜先祖、相互帮助、凝聚力量的“加油站”。华侨将关帝文化传入侨居国，为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及侨居国多元文化的形成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记者：这些年寻找关公的旅程有什么难忘且深刻的经历呢？

朱正明：在澳洲第一座由华人建造的大型关帝庙，墨尔本四邑会馆关帝庙内，我在关帝中堂右侧的华侨义祠，看到这里安放8000位华人先贤牌位，他们是当年采金、华工及各路华商。

中国广东省的台山、开平、新会和恩平四个县，被称为“四邑”。这几个县山水相连，语言相近，习俗相通，祖祖辈辈信奉关帝。两百多年前，四邑华人远涉澳洲淘金，在澳洲设坛祭祖，建立社团，创建金碧辉煌的关帝殿堂，关帝庙见证了华人华侨在海外创业发展的悲壮历史。

华人先贤同源同宗，他们下南洋淘金，为自我保护，聚集在一起，在异国设置了小关帝庙，举行拜祖。于是，庙殿形成了华人社团的雏形。在墨尔本四邑会馆关帝庙内，我想到这些热血青年当年怀揣关帝香火漂洋过海，寄身异国勤勤恳恳，生时追随关公忠义精神，到生命尽头，依然追随忠义，依傍关帝身边渴望回到我们的家乡，如回归故土一般宁静。关帝的忠义，在海外就意味着对祖国故土的怀念、对家人的忠诚，意味着肝胆相照精诚合作。置身那里，我不禁饱含热泪。

记者：您觉得运城在传播关公文化中是什么样的地位，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朱正明：黄河东岸，中条山下，有关帝祖庙，关帝祖堂，这里有非常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可以说，中华关公文化的根在黄河东岸，繁茂的枝叶长在全世界。运城拥有关公文化的“DNA”，流传着关公的忠义正信，拥有全世界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关帝文化基因。

每一位崇奉关公的人来到运城都会感到亲切与神圣，不仅由于这里是关公故里，还有厚重的历史文化，如若繁星的河东名家等。这些得天独厚的文化遗存文化底蕴让运城这座城市，在打造文化品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有着必然的优势。

记者：您认为今年关公文化旅游节与山西省第八次旅发大会同期举办将会带来什么样的机遇？

朱正明：我认为这是一件与时俱进的、值得借鉴的创新性做法。依托旅发大会这一重要交流平台，是丰富关公文化表现形式，将关公文化与经济发展、旅游文化、社会和谐相结合的做法，也将赋予关公文化更久远的生命力、更深远的影响力。值得一提的是，运城市委、市政府抓住关公文化这一亮点，为弘扬关公文化，满足人们崇拜关公的夙愿，举办的关公文化旅游节规格高、规模大、形式新，在保护、弘扬关公文化上，作出重大贡献，为全国关公文化旅游品牌建设作出了榜样。我要向运城父老兄弟表示敬意，表示感谢。